我的大学

我 1995 年上大学，那是我不幸的一年，也是我幸运的一年。不幸是因为高考失利，没有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。幸运是因为我上的大学很特别，其实很适合我。

那所学校有过很辉煌的历史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中国最高学府——哈军工。文革后被分拆，留在哈尔滨的部分成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。到我进大学的时候，学校又改了名：哈尔滨工程大学。这个校名经常让学生尴尬，因为别人总以为是哈工大。

虽然学校远居东北内陆，但它的龙头专业却是船舶与海洋工程。最特别的还不是名字和专业，而是学生构成。当时哈工程约有一半学生是第一志愿落榜生。

落榜生太多，校园开心不起来。我其实很爱玩，中学时期班级里的坏事，基本都有我的份。我也玩比较高级的，比如写小说、写诗、办诗刊等，浪费很多时间，所以高考失利也不奇怪。到大学后，除了写信，再也没写诗或小说，完全没有灵感。

在这玩不起来的校园里，大家各忙各的。很多人非常努力，努力准备考研，学习气氛好得令人窒息。

我的迷茫

我也很努力，但是也很迷茫，不知道未来做什么。我的本科专业也很特别：水声电子工程。据我所知，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只有哈工程有此专业。因为应用面比较狭窄，专业给我在职业规划方面的指导意义有限。

那时候校园信息闭塞，互联网要等到我大三时才出现。学长学姐经验的参考价值也很有限，他们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也很迷茫。

当时的我完全不知道，我的大学四年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最关键的时期。国企改革，住房改革，加入 WTO 谈判，都发生在这期间。我进大学的时候，进国企工作还是令人羡慕的，毕业的时候很多国企已经不存在了。在这转折时期，别说学长学姐帮不了什么，老师和父母也帮不了什么。可以说，在时代的弯道急流中，他们自己也无所适从。

私人定制

在迷茫中，我慢慢过上了“私人定制”的大学生活——自己规划未来，自己安排学习时间和内容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真是多。我看了很多书，把图书馆里有限的人文社科书籍几乎看了个遍。我尤其喜欢看传记，各种英雄人物、哲学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的传记，体验别人的人生。尤其是自传，像老者现身说

法，跟我说他一辈子的追求和选择。对迷茫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是无价的。

私人定制也体现在自学上。基础课几乎不点名，所以我经常缺席。但我绝不偷懒，总是出现在图书馆，自己选择教材和参考书，相当于跟多位不同的老师学习。我的自学成绩不错，偶尔会在重要的科目考试中大幅领先第二名，这让刚刚经历过高考噩梦的我慢慢恢复了信心。

当然，我不建议所有人都自学。老师能传授的不只是一个个知识点，还有它们所在的场景，点与点的联系，以及现实世界的运用等等。厉害的老师还会在课堂上挑战和启发思考，激发求知的热情。但即便到了今天，这样的老师也很稀缺。

如果系里有教授的讲座，那我绝不肯缺席。我至今记得当年水声工程系讲座的盛况。教授们已经上了年纪，但眼神炯炯，声如洪钟，用最朴实的语言讲他们的研究。他们的语调和表情，举手投足，每个细节都在告诉我，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。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，后来我也做了大学教授。

曲折的深造

大约在大三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：我要留学读教育。一个工科生，决心读教育。不得不说，哈工程的生活给了我无比的想象力和勇气。

当然，回过去看，我高估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。因为留学学费很贵，我要实现该计划，既要被一所教育学院接受，还要能申请到奖学金。后来我的留学计划果然卡在奖学金上。

不过没关系，我毕业后 gap 了一年，一边在本科导师的实验室做助研，一边再次申请。这次我向现实低头，申请了电子工程专业。这次很顺利，我拿到了若干 offer，其中有我非常向往的“米饭大学”，Rice University.

新世纪第一年，我满怀憧憬地去了休斯顿，打算在 Rice 研究信号处理。但是等我到那里，才发现我的导师已经不做信号处理了。两年后我又面临抉择，我又一次做了奇怪的决定：我要读经济学博士。

这次我做好了准备，跟经济系招生主任谈好，顺利拿到奖学金。没学过本科经济学课程，也没有关系，我有一门看家本事：自学。因为听说经济学需要很多数学，我还到应用数学系补了数学课。经济学高级课程我学得比较轻松，博士论文也顺利，四年就博士毕业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大学是决定性的。记得一九九五年夏天，我一个人乘两天一夜的火车到哈尔滨，非常有仪式感地跟过去告别。我努力学习，大胆尝试，失败了重新再来。到我出国留学时，已经信心满满，相信自己能应付一切。

我上的大学虽然普通，但是经我自己定制的大学，是世界级的。